

漫话“惊蛰”

文/陈赫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随着时光脚步的推进，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惊蛰就要来临。

惊蛰，时间在农历每年二月初一前后（公历3月5-6日之间）。惊蛰，“蛰”是藏的意思。惊蛰是指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物，也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

惊蛰曾被称为“启蛰”，在汉景帝以前的文献中，出现的有关惊蛰的词语都是“启蛰”。《左传·桓公五年》里曾写道：“凡祀，启蛰而郊。”意思是凡是祭祀，启蛰时举行郊祭。郊天之礼是周代最为隆重的祭典，祭祀天地日月的活动，皇帝亲自参加。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统农事历书《夏小正》也曾有这样的记载：“正月启蛰，言发蛰也。”

启蛰被改名为惊蛰，出现在汉朝第六代皇帝汉景帝时。在古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在说话或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以示尊重。汉景帝名为刘启，正好与启蛰相冲，所以为避汉景帝名讳，而将“启”改为了意思相近的“惊”字。这一点在南宋经史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有所记载：“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

此次改名还引发了中国节气史上的一次巨变，节气的顺序有了很大的调整，汉景帝之前为“立春—启蛰—雨水—春分—谷雨—清明”，汉景帝之后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及至唐宋时期，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以后，“启”字的避讳已经没有必要，于是“启蛰”的名称又重新被使用。在不少文学作品里，又出现了“启蛰”的身影。如唐代柳宗元《非国语·不藉》：“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南宋曹彦约《惊蛰后雪作未已阴之湖庄》：“启蛰候虫犹自闭，向阳梅子自能酸。”

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开元年间得以改变。由于人们长期的用语习惯，著名僧人一行编《大衍历》时，再次使用了“惊蛰”一词，并沿用至今。

惊蛰在历史上沿袭千年，也有众多的习俗流传下来。如祭白虎化解是非：民间传说白虎是口舌、是非之神，年都会在这天出来兴风作浪，给人们带来百般不顺，大家为了自保，便在惊蛰那天，以猪血、生猪肉祭祀白虎。

又如惊蛰吃梨。惊蛰吃梨的习俗源于何时，无迹可寻，有说吃梨是为了记住祖先创业之艰难。有说吃梨是为了助益脾气，以增强体质抵御病菌的侵袭。

“仲春遵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到了惊蛰，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万物开始进入灵动的时分。而一年的希望正是从此时开启，人们期盼的收获，也会越来越近！

赤脚医生张漫珍

文/王丽君

故事应该从四十年前的那个阳春开始说起。

“张医生，您的眼睛肿了，快去医院看看吧。”那天，在一间农家屋里，村民曾顺生着急地对一个穿碎花衣的女子喊。

女子叫张漫珍。只见她左肩挎着行医箱，右手使劲捂着右眼，似有剧痛伴随。

当天，她为他家5岁的儿子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那孩子因为害怕打针而哭闹，小手逃离母亲的臂护，一拳打在张医生的左手上。一瓶刚打开的药液，几乎从张医生手中“跳”起来，洒向空中，同时也溅入了她的右眼内。

她虽用盐水反复冲洗，但疼痛很快紧随而来，感觉到越来越严重了，便急忙收起医药箱，打算去乡卫生院，没想到村民曾迪成神情紧张地跑了过来。

“张医生，我老婆快要生了。乡卫生院的医生说是什么‘踏花生’，让我们转县人民医院。我们家，出不起这个钱呀。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只能求您帮忙了。”

张漫珍知道，他家拿不出几元钱，又无车，村里与县城相隔五十公里……“踏花生”是医学理论中的足先露，属于胎位不正的一种。乡下无数女人因此而与生死只隔一道门，或大人孩子一并不保。

“我去看看再说。”张漫珍愣了一下，没再顾及村人的提醒，跟着曾迪成向他家疾步奔去。

28岁的张漫珍，初中文化，在乡下不多见。几年前，她被村里选为了赤脚医生。聪明好学、勤劳善良的她，在三个月的培训期间，不但被评为优秀学员，还经县卫生局的考核考核获得了行医证。从此，她踏上行医之路，与同行一样，没有固定编制，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

1974年后，随着乡村合作医疗队伍的扩大，赤脚医生开始分工明确。张漫珍负责村里的疾控防疫、妇女儿童保健等工作。每年为儿童打预防针，预防流感、天花、结核，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其中。哪怕是暮霭沉沉的深夜，或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人求医，她都随喊随到。

夏天，她到枚子冲村民熊新秋家出诊，熊新秋当时高烧不退。诊断后，确定没有大问题，张漫珍便对熊新秋爱人说，“你忙你的去，我来帮你照顾她吧。”她知道他在工地做事，耽误时间就是耽误工分。接下来的几天，她负责给熊新秋打针，顺手帮她洗脏衣服，还从自家带了米，熬了粥端到她床边。

记忆最深的是，接生时，她总是为产妇着急，总是担心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上有闪失……在从医期间，她以医者的责任，让一个个孩子从她温暖的手中来到人世。

回到本文的开头。

张漫珍医生用医用纱布绑着眼睛，忍着痛，在曾迪成家守了三天，用“外倒转术”纠正胎位的方法，帮助产妇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却耽误了自己最佳的治疗时间。直到曾迪成喊来邻居，与她的爱人一起，把她送往县里的医院。

她患上病毒性角膜炎，当时没有特效治疗办法，辗转县里多家医院，医生都建议她到省级医院就诊。

此后，为治眼睛把家都治穷了，仍不见起色，附近村的赤脚医生、老百姓还纷纷捐款，但对于她的眼病治疗仍不过是杯水车薪。

如果还是没有好转，最后的方法只能把眼球摘掉。省中医附一医院医生见她有时痛得休克，便和她商量，她没有接受。好在又熬过了些日子，疼痛减轻了一些，但每次复发，还是痛得死去活来，视力也由原来的1.5降至0.5。

那些日子真是永生难忘，为了治疗眼睛，她不停地往医院与家之间往返，最长的一次一个多月没回家……眼睛不疼的时候，还继续为村民行医看病。

时光荏苒，如今，张漫珍像许多赤脚医生一样，已年过花甲，她的眼睛痛了八年，现在视力依然很差，儿女们把她接到了长沙生活。

那个棕红色的行医箱，她依然保存着。背带已磨破了皮，箱子里有一块旧得掉皮的红色油布，有一把弯头不锈钢剪刀，一支旧水银血压计，一个旧皮管听诊器……

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搬家几次都带着。我知道，行医箱不只是属于她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那一代赤脚医生的记忆，那一代农民的记忆。不管时光如何流逝，永不褪色的记忆，像血压计的水银，晃动着银色的光芒。那一刻，我看到张漫珍老人满身银光。

是的，她与许许多多与她同样的人，回首之时没有苍白潦草，只有走过田野与山坡的亲切，只有与千家万户心贴着心的温暖。

折柳寄情！ 中国式浪漫有何深意

文/郑学富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上，独具东方韵味的折柳寄情给很多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伴随悠扬的乐曲《送别》，演员手捧发光柳枝，轻盈缓步进入场地，走过之处，微风轻拂，柳枝摇曳，这是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运健儿依依惜别。

折柳寄情的传统在中国其实由来已久。《诗经》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赋予了柳树的留别意境。刘禹锡有“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的吟诵，唐彦谦有“晚来飞絮如霜鬓，恐为多情管别离”的诗句。柳絮之“柳”与“留”谐音，“絮”与情绪之“绪”谐音，古人折柳相赠，有难舍难分、依依不舍之意。

古代地理专著《三辅黄图》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于是灞桥折柳赠别好友成为一种时尚。唐人吴融在《咏柳》一诗中写道：“灞陵千万树，日暮别离回。”李白也有“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诗句。

由于灞桥之上，无数次上演生死离别的场景，成为销魂伤心之地，故又称灞桥为“销魂桥”。

《开元遗事》中说：“灞陵有桥，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称为‘销魂桥’。”刘禹锡有诗句：“征徒出灞浐，回首伤如何？”沈彬也有“一条灞水清如剑，不为离人割断愁”的诗句。久而久之，“灞桥折柳”演变成一种风俗，风靡全国，沿袭历朝历代。

宋代以后，京城东迁，灞河垂柳已不再有昔日的郁郁葱葱，灞桥之上车马辘辘的离别之景也少见了。宋代词人柳永在《少年游》中写道：“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朝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明人徐复祚也有“则看他迎风袅袅，笼烟袅袅，肠断灞桥滨”的诗句。明清时期，灞桥之上的缠绵离别之情已不复存在，只有古道沧桑，残阳夕照，柳絮飞舞。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时任河东监使的朱集义咏诗作画，描述了关中八景，其中《灞柳风雪》一诗写道：“古桥石路半倾欹，柳色青青近扫眉。浅水平沙深客恨，轻盈飞絮欲题诗。”

在闭幕式表演中，柳絮翩翩飘弄，漫天飞舞，似离别愁绪，也是延续生命的种子。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有强大的生命力，插土就活，年年插柳，处处成荫。折柳赠别还蕴含着美好的祝愿，希望亲朋好友到了新的地方，能迅速适应新环境，像柳条一样很快地生根发芽，长成一片新绿，成为一望无际的森林。清朝陕甘总督杨昌俊看到当年左宗棠在河西走廊和新疆所栽的柳树已是莽莽苍苍、郁郁葱葱时，不由地感慨万千，写下了诗句：“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